

纪实摄影家应是本土视觉代言人

——本报记者孙振军对话摄影家黄一鸣



黄一鸣作品《海南“慰安妇”》

摄影师要带着编辑思想去拍摄创作。不会编辑的摄影人，很难成为摄影大家。

摄影是一门综合艺术，要上一个高的台阶，还要掌握丰富的其他门类的知识。

(上接 13 版)

孙振军：很多人都说，摄影家要带着编辑思想去拍摄，这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问题。你是如何带着编辑思想进行拍摄的？

黄一鸣：我始终觉得，作为一个摄影人，不仅要会摄影创作，还要熟练地掌握编辑知识，这是相当重要的。摄影师要带着编辑思想去拍摄创作。我的许多摄影专题就是在编辑中创作、在创作中编辑而完成的。不会编辑的摄影人，很难成为摄影大家，还有可能终生成为摄影匠人，或者是为此付出沉重代价。

懂编辑，你才会知道如何用一组摄影作品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如何在细节中完善一个主题。摄影作品中有宏观有微观，有直叙有转折，有主体有陪体。但这些都可能在拍摄创作、编辑思考的过程中想到和拍到，这就需要有编辑思想。

我能推出如此多的摄影专题，主要还是得益于自己学习了编辑。每一部摄影专题像完成一首震撼流畅的交响乐曲一样，每一个章节都和整体相关联。没有学过编辑的摄影朋友，最好能谦虚地向从事编辑的老师学习，或结识一位会编辑的老师，这样有利于自己的纪实摄影创作和编辑出版。

摄影是一门综合艺术，要上一个高的台阶，还要掌握丰富的其他

门类的知识。这样在摄影创作过程中，才能明白自己所站立的位置，才能从宏观的角度丰富摄影本身。

此外，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家还要学会文字写作，多读一些文学作品，这样对摄影创作也会大有益处。许多的纪实摄影专题都要与文字相辅相成，有好的文章配合才能完成有深度的纪实摄影专题。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家一定要成为自己艺术创作的主人。

孙振军：主题和非主题纪实摄影在你身上都有体现，那么你认为哪个更重要？为什么？

黄一鸣：主题和非主题性纪实摄影作品要看题材而定，但我的大部分纪实摄影专题都是有强烈的主题性，有些是有意识的，但有一些是潜意识的，这取决于你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，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民俗、科学等知识的掌握程度。因此文化涵养高、知识渊博的摄影师，就会创作出更有深度、更耐人寻味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经典纪实摄影作品。比如巴西著名纪实摄影家萨尔加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完成的《劳动者》《移民》《创世纪》等，这样宏大的纪实摄影专题都是我们说的主题性摄影作品。其实我在海南做的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《海南故事》，其他许许多多的专题都是围绕它展开的。这也得益于著名摄影家王文澜老师对我的指导。

纪实摄影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文关怀，能够在质朴的图像中体现出深刻的内涵，在普通的自然环境摄影中体现着非同一般的意义。

孙振军：前面聊了很多纪实摄影，纪实摄影一直是摄影界关注的话题，你对纪实摄影的定义是什么？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、艺术摄影的关系与区别？

黄一鸣：一直以来，纪实摄影在中国摄影界有聊不完的话题，有时候也是众说纷纭。我认为纪实摄影是有严格定义的。定义搞准了就能引导你获得理想的纪实摄影佳作。摄影评论家鲍昆曾在《纪实摄影的本质是人文关怀精神》一文中解释过。

我的理解，现今的纪实摄影广义地说，每张照片都具有记录性质，只要不是弄虚作假的，可作为某一事件发生之后的一个实证资料。纪实摄影的第二层含义(狭义的纪实摄影)首先因为本质是人文关怀，它有影响社会的作用，因而也称为社会纪实摄影。社会纪实摄影是要记录当下某种社会状态，进而影响社会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它与作为纪录资料的新闻摄影有所不同。

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有许多不同之处，但可以相互渗透、互相借鉴与互补。纪实摄影的图像语言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，可以让新闻图片给人更大的震撼，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，而新闻摄影准确的文字诠释也可以让纪实摄影作品锦上添花，更具历史的价值。

纪实摄影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文关怀，能够在质朴的图像表现中体现出深刻的内涵，在普通的自然环境摄影中体现着非同一般的意义。

我认为，摄影记者要用好的纪实摄影语言来关注社会、关注人生，对身边的生活进行理性审视和艺术扫描。

纪实摄影和我们目前划分的艺术摄影，应该是属于不同范畴上的摄影创作。因此本人认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

孙振军：《海南“慰安妇”》这组作品，能否谈谈你的创作初衷以及创作过程？

黄一鸣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侵华时期，上千万的中国人民受尽蹂躏、摧残和屠杀，其中超过 20 万中国妇女被强迫充当日军的“慰安妇”。这一被日本政府默许的罪恶制度导致 40 余万中、朝、东南亚以及欧美妇女惨遭蹂躏，沦为日军的性奴隶。但是能够活到 21 世纪的有“慰安妇”经历者已经不多，而敢于站出来控诉者更为寥寥。这是因为这些战争的牺牲品所受到的凌辱乃为他人难以想象，“慰安妇”的特殊经历，成为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漫漫人生路上挥之不去的梦魇，她们不仅在身体上遭受到严重摧残，精神上的巨大创伤更是永生折磨着她们。

从 2005 年开始，我为了在《中国日报》上做一组专题报道，在海南岛境内寻

访惨遭侵华日军蹂躏的“慰安妇”。当年经过多方努力，证实有 20 余位海南“慰安妇”有案可查，其中已有 4 人去世。之后的一年时间里，我行程几千公里，走访陵水、保亭、琼海、澄迈、临高、三亚、海口等市县的 20 余个村镇，一共采访到 23 位老人。又在以后 12 年的时间里多次反复跟踪采访拍摄幸存的“慰安妇”老人，记录她们的生活状况，帮助她们控诉日军的暴行。这些惨遭蹂躏的“慰安妇”身为受害者自认无颜面对亲人和邻里。有的“慰安妇”因此不愿回忆过去，更不愿面对镜头。在陵水“慰安妇”陈亚扁的寻访中，我前后去了五六次，和老人谈心，带老人寻医问药，帮老人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，赢得老人信任后，才拍下一组老人的纪实照片。

12 年后的今天，这个《海南“慰安妇”》的专题传播面很广，取得了很好的教育和铭记历史的作用。中国慰安妇研究所、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利济巷慰安馆、海南省档案馆等单位都收藏了大部分的照片作为资料展示和研究，并起到了控诉日军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的目的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到 2017 年下半年仅有 4 位幸存者了。

我认为，摄影记者要用好的纪实摄影语言来关注社会、关注人生，对身边的生活进行理性审视和艺术扫描。

纪实摄影和我们目前划分的艺术摄影，应该是属于不同范畴上的摄影创作。因此本人认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

孙振军：你觉得现在是中国纪实摄影的最好时代吗？对中国纪实摄影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？

黄一鸣：现在仍然是中国纪实摄影发展最好的时代。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成熟，各省市面貌焕然一新，而各地的建设如火如荼在进行中，中国在城市化建设的道路上也正在加快步伐，从城市到乡村也涌现出许许多多生动的人物故事。这给中国的纪实摄影家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，这许许多多的题材是取之不尽的。

所以，中国纪实摄影的未来是广阔的。与此同时，许多知识面很广的新生代纪实摄影家们在成长，纪实摄影的表现方式、表现手段、语言形式也更加多样化，而且也在国际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。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，也体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和地位。

当然，目前中国纪实摄影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是有欠缺的，特别是在表现人性的本体语言上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挖掘。希望今后纪实摄影作品表现的题材更广泛一些，纪实摄影语言也更加多样化，主体意识更强一些。(原刊于《人民摄影报》2017 年 12 月 27 日第 52 期第 5 版)